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逻辑理路

陈 艳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江苏南京 210024)

摘 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生成逻辑理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发展是其理论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超越升华是其文化逻辑;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承接开拓是其历史逻辑;习近平个人成长发展历程中对生态文明的不懈探索是其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其社会逻辑。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逻辑理路将有助于更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价值意蕴,也为推进当代中国生态治理和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然规律;生成理路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1-0035-07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生成都是时代的需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问题为导向深度剖析了为何建设生态文明、以未来为目标着力描绘了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以实践为源泉精辟论述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相结合的创新发展。这一思想的生成发展有其严密的逻辑理路,有必要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考量,从理论、文化、历史、实践和社会等逻辑维度进行学理剖析,以

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厚的理论基础、明确的价值诉求、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宽广的世界视野。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关注人类在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并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深刻揭示了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探索的思想成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奠定了

收稿日期:2018-12-0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目(2017ZDTXM027)
作者简介:陈艳(1973—),女,江苏扬州人,副研究员,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高教管理研究。

坚实的哲学基础。

1. 人与自然密码的生态破解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一方面,人是有生命特征的自然存在物,通过自身的一系列生产实践活动实现与自然界和物质交换,并受自然界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激情的存在物,具有能动性,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有目的性的改造,从而使自然与人的社会活动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人化自然,也是人类社会获得物质基础的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38-39}但自然界的循环发展又是有规律的,因此,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顺应和呵护自然,否则就会造成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同一过程,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体现在人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生产劳动中。

2. 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时,系统考察了西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恶化现象,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片面追求利润的无限扩张,造成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从而使得人与自然处于紧张对立与异化状态,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从自然界的索取远远超过人类自身对自然的回馈,破坏了正常的自然环境。对此,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59-560}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自然界就成了被利用和被掠夺的对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逻辑扩张的必然结果。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环境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自然问题,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摆脱人与自然的异化状态。

3. 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态展望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与自然界不停地进行物质交换,随之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因此,人与自然的矛盾本质上是人与人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一系列物质条件,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逻辑的局限,其本身无法克服生态危机,只有通过建立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才能实现。之所以共产主义能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者联合起来,用最小的消耗,在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而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逻辑的扩张和掠夺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展望与探索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追寻。总之,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决不能把自身与自然界分割开来,只有清醒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体,才能保护自然,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二、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超越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智慧,其所崇尚自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物顺时”“圣王之制”基本内核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来源。

1.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思想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天人合一”。这其中,“天”有着丰富的涵义。儒家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人类的本源,万物和人都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天”既是自然的天,也是德性的天。孔子提出“践仁知天”,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践行了仁德,从而就能知“天”,获得了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进而实现“天人合一”。

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实施仁德、净化内心,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同胞来看待,把万物都当成人类的朋友,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2. “道法自然”的哲学向度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则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是指事物发展的一种内在属性,因而是一种自然的“道”,是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中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老子认为,人们只有崇尚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道法自然”本质上强调的是万物的生长繁衍应顺其自然,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告诉我们,统治者必须依据“道”的原则治理国家,依据自然规律从事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顺物自然而无荣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境地,既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又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3. “取物适时”的动态平衡

“顺应天时,节约用物”是中华传统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过,钓鱼而不用鱼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是以“人道”恩及禽兽。“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要求人与天地自然相处时要保持动态平衡。这表明,先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只有不违反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利用自然做到有理有节,才能维护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4. “圣王之制”的制度约束

夏朝的“禹之禁”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其实在《尚书》《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对生态资源的立法均有大量的描述。如《礼记·月令》载:“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即人们在利用与开发自然时应顺时合理,即使帝王也应遵循自然,其发布政令都要以服从自然规律和生产规律为根据,只有这样,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才能正常进行,这就是“圣王之制”。在法家看来,要用法律来制约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如加强对山川林木的保护、合理开

采生物矿产等。应该说,秦汉时期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规定已经较为完备,《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等都有一系列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并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对后来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影响深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尺度提出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顺应了“天人合一”理念,就是要达到自然与人的永续生存,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之德”的理想状态,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的生存观的历史性传承和提升。

三、历史逻辑: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承接开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中都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来指导生态治理实践,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1. 毛泽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对生态治理进行了探索性思考 and 实践。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强调,空气、森林和地下宝藏等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重要因素^[4]。他还要求全国人民在宅旁、路边、水旁以及废地荒山上尽可能多植树,实行绿化^{[5]509}。同时,针对我国频发的洪涝灾害,毛泽东强调要兴修水利,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6]。1950年淮北区大洪水之后,毛泽东提出从根本上治理淮河的要求。1950—1957年,国家对淮河进行了根本性的治理。1951年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对防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此后的20多年间修建的8万多座水库,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强调,社会生产需要节约利用资源,建设社会主义要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他认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5]447},各个生产领域都注重节约并提供经济效益,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气。

2. 邓小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持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指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从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随之,生态文明探索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毛泽东的生态文明观。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利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依靠科技开发能源,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缓解资源匮乏问题。他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7]。邓小平还非常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强调要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197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了可依之法。邓小平还倡导推行全民义务植树,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理想远景,指出中国的林业要上去,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如每人每年都要种植几棵树等^[8]。1981年12月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使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全民性、公益性、法定性的义务。

3. 江泽民、胡锦涛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具体实际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江泽民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经济发展速度应与改善环境、保护环境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他强调,应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同时考虑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并且要把这些问题放到重要位置^[9]。进入新世纪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发表讲话指出,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更好解决。在此基

础上,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融为一体,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征程。

4. 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拓新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战略部署,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而是要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顺应时代和环境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丰富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十大关系”的论述,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回应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遵循。依据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强调,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21]}的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思想,生动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理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186}。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与升华了我们党关于生态理念、发展理念的内涵。与此同时,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习近平指出,只有采用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12]210}。为此,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建成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推进到依法治国的高度。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以恢宏的全球视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携手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他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全人类未来的事情,世界各国人民应携手合作,共同探索谋划生态文明建设路径^[13]。这充分彰显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政治担当和生态情怀。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承接了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致力于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体系,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更有深度和高度。

四、实践逻辑:习近平成长发展历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探索

从实践逻辑来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随着从政地位、肩负使命和责任担当的变化,习近平对生态问题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随着实践而发展,形成了深邃的生态文明思想。

1. 具体生产实践中的深厚生态情怀

1969—1975年7年的知青生活造就了习近平最初的自然观。在梁家河生产劳动实践中,他已经意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先认识自然才能改造自然,在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必须遵循这种良性循环才能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他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期间,学习四川沼气建设技术,并将技术引进梁家河,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当地老百姓做饭和照明的困难。在当时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习近平不仅认识到沼气在资源循环利用中的作用,而且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这些实践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源泉。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结合当地的自然优势和人文优势,把握正定历史名城的特点,创新旅游模式,主张利用优势来发展经济,实施旅游兴县,从而使正定县真正实现绿色减贫、可持续减贫。这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发展旅游业振兴经济的举措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的前瞻性生态情怀。

2. 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生态文明理念

在福建担任领导期间,习近平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一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社会发展战略高度。1992年,习近平主持修订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理论,指出要“把福州市建设成为清洁、优美、舒适、安静、生态环境基本恢复到良性循环的沿海开放城市”^[14],强调加强城乡绿化,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他

还提出了福建“建设生态省”的构想,这成为习近平后来任职浙江时提出大力建设生态省的思想 and 实践来源。二是用生态文化来推进地区生态建设。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明确提出了“八八战略”“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的发展蓝图^{[11]72}。作为一名区域发展的谋划者,他思考如何由政府推动局部区域的生态建设转向如何用生态文化来推进地区生态建设。三是提出“两山”论断。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要求干部群众“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15]“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个通俗无比的普通词语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演绎得淋漓尽致。10余年来,浙江生态建设始终走在前列,这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发展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3. 国家全局战略中的生态文明机制

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习近平更加注重从国家全局战略层面来阐释和部署生态文明建设,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2]211}他的“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蕴含的生态思想涉及生态生产力、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等诸多方面,使生态文明建设在重点突破中实现整体推进。从本质上讲,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辩证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努力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进而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社会逻辑:当代中国和全球生态治理经验的深刻总结

习近平始终坚持世界历史眼光,强调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对此,中国责无旁贷,世界各国更要携手鼎力,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生态文明方得始终。

1. 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指导生态治理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蕴含了丰富

的哲学思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上,他提出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系统建设的角度,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统筹考虑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0]23}这就是说,搞经济建设要转变思路,牢固树立保持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理念,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可见,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而创造出的经济价值意义都不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在生态与文明的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1]186}的科学论断,表明社会的发展是文明的,也是生态的。只有将生态文明融入人类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自然才是生态的,人和自然才是和谐的。同时,辩证地、全面地推进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他提出的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破解生态文明建设难题的指路明灯。习近平坚持用发展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系统而非零散、普遍联系而非单一孤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2. 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生态治理的价值旨归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4}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阐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升华了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引用当地群众的话“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16]来阐明发展林业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强调增进民生福祉与保护人文环境的统一,

这是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应从老百姓的满意度和答应度、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来看待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才是真正的发展。所以,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不能片面地追求速度,更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我们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摧残人自身生存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文明的期盼为依归,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取向的认知。

3. 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之路

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治理道路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价值追求,而中国特色,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聚焦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几千年来生态实践,致力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其思想源于实践,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实践土壤深厚。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上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亟须探索一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道路,就是要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推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坚持边发展、边治理、边补偿、边优化的方针,才能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得以破解,从而使发展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

4. 以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自觉探索推进全球治理一体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7]。从世界的互联互通的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业已成为人类更好发展的时代呼唤,而生态文明建设正是这一主题的具体体现。生

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特征,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世界各国都应尽最大努力加强合作、承担环保责任。对此,习近平鲜明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12][212]}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将自觉承担应尽义务,并同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同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地球美好家园建设。中国的言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也作为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促进了全球气候谈判。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平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全球一体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结 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思想基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批判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有益思想,并在深刻总结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新趋势,顺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并分析当代中国和全球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基础上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化解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56.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3.

[8]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71.

[9]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63.

[10]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97.

[14] 习近平. 福州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M].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3:146.

[15]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86.

[16]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10.

[17] 习近平. 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N]. 人民日报,2017-07-05(03).

(责任编辑:许宇鹏)

